

文物荆州

从考古发现看长江流域最好吃的城市

□文/张卫平 图/金陵

我们说屈原是个“吃货”,其实他2000多年前生活和工作过的荆州城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吃货的城市”。每到临近春节,荆州古城满街飘香,艳阳下到处都晒着腊肉、腊鱼。在国家一级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里,用于吃喝的器物更是各具特色、琳琅满目。因此,有人打趣道,荆州与其说是一座古城,倒不如说是一座“吃货的城市”。有人甚至说,荆州就是长江流域“最好吃”的城市。

的确,荆州人爱吃,能吃,有得吃。从想当然的角度来说,大概是因为荆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流动人口频繁,南腔北调自然众口难调,地理上处于南北之间,互通有无,没有吃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南米北面”兼而有之,“南甜北咸东酸西辣”博采众长。

其实,荆州不过是“吃货中国”的一个缩影。窃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吃文化,我们就是“舌尖上的中国人”。《汉书·酈食其传》不是早就说过,“民以食为天”嘛。当时,匈奴人被汉军杀的逃走漠北,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一食一色,游牧民族看得简单透彻。不过,中原是农耕社会,即便牛羊,也有炒、爆、炸、烹、溜、煎、烩、扒、烧、炖、焖、余、煮、酱、卤、蒸N种做法。中国人对于吃的执着,孔老夫子已有言在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甚至还将吃饭列入人生重要的享乐,说什么“食不裹精,脍不裹细”。

在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类十分重要的文物——“吃文物”。简单地说,就是食材和吃喝使用的器具。

在中国,最为重要的食物无非是“米”,旱作的粟米称为小米,水生的稻米是为大米。但是,最早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史前稻作遗存的,则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他于1927年在距今约5000年~7000年间新石器时代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片上的稻谷印痕。

此后,中国考古学界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世界和中国稻作起源的时间记录。

197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7000年前的稻谷,证明了稻的栽培起源于中国;

1993年,又在湖南道县玉岩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古栽培稻,距今约14000年~18000年。

每一次的考古发现,都将水稻的栽培历史向前延伸。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距今4000年以前的史前稻作遗存已发现173处,是世界上发现这类遗存最多的国家。在这173处史前稻作遗址中,仅湖北、湖南两省的就有57处之多。其中,荆州市有监利福田、柳关和松滋桂花树、荆州毛家山、荆州城及公安王家岗等。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引用过一句“古人云”的古语,“美食不如美器”,他是要说美食需配美器,求美上加美的效果。而在荆州博物馆里,就收藏了大量的用来盛装食物的文物,鼎、鬲、豆、罐不一而足,釜、敦、簋、甗蔚为大观。

正如旅美作家李亚述在《舌尖上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的,“中国每一次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不是思想,不是科技,而是中国的食文化发现一个地下城堡,挖掘一个陵墓,不论主人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死后的殉葬品,都以盛装食物的金、银、铜、陶、瓷器为主,只不过奢华程度不一而已”。

的确,步入荆州博物馆展览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大小小的青铜鼎了。



铜升鼎 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 口径38.7厘米 通高42.4厘米 2000年荆州天星观2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鼎,青铜器中的主要食器,烹煮或盛放肉类食物。相传夏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象征九州。自此,鼎被视为国之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的基本形制有方形和圆形,方鼎四足,圆鼎三足。

鼎是青铜器里最重要器种之一,是古人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2000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

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阳,以象征九州。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国之重器。作家李亚述说,中国从三代开始,就以炊具作为权威的象征,“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而贵族品级则是以炊具“爵”定位。如果烹调象征“文明”,中国人进入文明境界之早之彻底,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先生说:“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即用‘熟’与‘生’作为区分‘文’与‘野’之符号。由此角度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文明的国家,而潜台词是‘恐惧’也是最腐化的民族。”

那时候,拥有的鼎越多,饭菜的种类就越多,排场也就越大。

俗话说“一言九鼎”,足见吃饭也体现了地位的高低。当年,楚庄王问鼎中原,其实也是在与周天子比“吃喝”的排场,在“吃喝”中彰显其霸气。



铜整 秦代至汉初(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 腹径18厘米 高16厘米 2008年荆州谢家桥74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彩绘猪形漆盒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1986年湖北江陵雨台山56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簋,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说文》:“饭器也,方曰簋,圆曰簠,盛黍稷稻粱器。”簋有圈足簋和方座簋两种形态,前者流行于春秋以前,后者流行于战国时期。簋是商、周时期重要礼器,常作偶数,与奇数列鼎配套使用,代表贵族的等级身份。

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就说26年前吧,为了庆祝联合国5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5年10月21日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青铜巨鼎——世纪宝鼎。

而在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之际,中央政府也向西藏自治区赠送了“民族团结宝鼎”。此举意义深远,文化内涵颇为丰厚。



饗饗纹簋 西周(前11世纪中叶~公元前771年) 荆州万城遗址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古往今来,可以说“吃”是人的第一本性和生存的最为根本的需要。所以,政治家们常常说,能解决十多个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也难怪“菜篮子”永远是官员和百姓说不完、道不尽的核心话题。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发生,使得“温饱”成为“问题”。

于是,在古代国家被说成是“江山社稷”,这个“稷”就是指粮食。在古书上,大多说成是黍类,也有的说成是谷类。

所以,古代一直以“稷”为百谷之王,历代帝王都奉祀“稷”为谷神,进而指代国家。

粮食等于国家,透露出的信息则是人们对于生存的渴望。正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俞为洁在《饭稻衣麻》一书中写道的:“稻是人类最早栽培和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当今世界,有20多亿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人体内20%的热量及13%的蛋白质都来自于稻米。”

所以,几千年来,老百姓已经视“吃得饱”为幸福了。“民以食为天”,在中国更是衍生成为丰富的饮食文化。

秦人以这种造型简朴的整为炊具,置之於灶上以煮食物。此种圆底炊具的流行,导致了三足鼎的衰落。

大量的考古成果足以证明“吃货中国”佐证。除了在商周等奴隶社会时期,随奴隶主贵族陪葬的物品以青铜礼器为主,大约从战国晚期开始,墓里开始葬有稻、粟等农作物。

而到了西汉文景时期时,以荆州为中心的楚地则开始流行随葬陶仓,并在陶仓中放置稻、粟等食物。仓身圆桶形,口微敛,平底,圈足(有两个长方缺角),靠上部有一方窗,上下各有两道弦纹。一侧中部有一小圆孔,另一侧的上下各有一个小圆孔。仓盖作圆攒尖顶,上有凸出的瓦脊。出土时,仓内尚有小粟,通高26厘米。

荆州自古是鱼米之乡,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起源很早。从考古角度而言,就已出土了大量与种植、收获水稻有关的石刀、石铲、石镰等原始社会农业生产工具。比如,位于荆州古城北几公里的鸡公山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从几千年到几万年前的都有。

同时,在京山屈家岭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武昌放鹰台、监利福田遗址和公安县王家岗遗址,也都发现了几千年前的稻谷壳或炭化的稻谷灰。经中国农业科学院丁颖院长鉴定,在这些古遗址里发现的稻谷壳,属大粒的粳型稻,与现在江汉平原普遍种植的稻种相同。

更为神奇的是,1975年秋,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在纪南城凤凰山167号汉墓中出土的陶仓里,发现了四束外形保存完好的稻穗。

这四束稻穗,在出土时色泽鲜黄,穗形整齐,颗粒饱满,芒和刚毛清晰可见,外形保存完好。

记得2007年,我曾在沙市谢家桥西汉古墓的考古发掘现场,亲眼看到刚出土的一罐金灿灿的稻谷,不过,却在考古人员用手捧出陶罐的瞬间,就变成了青灰色。

这四束距今2100多年的稻穗,出土时的情景同样如此,也在刹那间由金黄色变成青灰色。经鉴定,这四束稻穗为粳稻,属于对光照不敏感的早、中稻类群,与华南早季稻为同一类群,其穗长、粒重、生育期、芒、谷粒形状等等,都与现代粳稻基本相同,只是穗粒数仅为现代品种的一半。

迄今为止,我国先秦的考古发掘,不仅没有见到过保存完好的稻穗、颖、茎、叶,就是稻谷的果粒,大多也只是存其壳或者碳化。比如,在楚国故都纪南城,当地群众曾挖出过成堆的碳化稻米。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陈家台发现了楚国储藏粮食的仓库,里面有着五处碳化的稻米堆积物,明显有被火烧过的迹象。经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碳14实验室化验,这批碳化的稻米距今已有2300多年了。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时期楚国就有三大粮食基地,而国库充足的粮食储备“粟支十年”,一再为楚国政权的稳定做出贡献。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纪南城,一把冲天大火将纪南城烧成废墟,陈家台这个楚国的大粮仓,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中被烧毁后埋没于地下的。

考古资料表明,荆州凤凰山西汉古墓发现的稻穗,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外形保存最好的稻穗。

可是,为什么荆州发掘了上万座古墓葬,为什么别的古墓里都没有出稻穗,考古人员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取决于墓葬的密封情况;二是取决于季节。

考古人员同样在保存很好的荆州凤凰山168号西汉古墓里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稻谷,却没有发现稻穗。原来,在墓主人下葬的季节里,江汉平原的稻谷还没有成熟哩!

而荆州凤凰山167号汉墓的四束稻穗出土时色泽金黄,说明是刚刚收割或收割下来不久的。据此推测,这个墓主下葬时,可能正是水稻收割时期。

除了带上稻谷,在那“民以食为天”的年代里,古人在“上路”时往往还会带上猪马牛羊牛肉,有的甚至还会带上几坛美酒。

2000年2月,在沙市天星观2号楚墓中就出土了随葬的水牛、黄牛、猪、鸡和鲤鱼、乌鳢、鲫鱼、红鲃等鱼、禽、兽的骨头。

而1975年在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有牛排、鸡骨、鸡蛋、梅、枇杷、李、杏、花椒、核桃、生姜、葫芦以及一大批酒器酒具。可谓是凉菜、热菜、作料、水果和酒水样样俱全了。

帝王将相有阳春白雪的享受,农夫劳工也有下里巴人的快乐,这是中国饭菜的魅力。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流行,正因为拍的是吃货,讲的是人情、乡情,“吃”中有“情”,中国饭菜最复杂,也最简单。

俗话说:食不言、寝不语。对于中国人来说,“吃”不仅是生命的需要,在某些语境下更是一种仪式。或许,工业化和全球化能摧毁乡土社会的聚合,但始终无法剥夺我们对吃的独有情怀。

如果说,麦当劳和肯德基展现的是工业时代的工厂式车间文明,一切都是那么透明、干净、快捷却又毫无个性。那么遍布大街小巷的小饭馆、私房菜,则潜藏着老板或者厨师对于吃的理解,甚至对于人生的不同解读。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华裔教授张光直说:“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透过它的肚子。”

所以,“吃”这一最为生物化、物质化的层面,可能是理解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和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切入点。

什么是中国?或者中国是什么?如果从吃的角度来看,没有猪肉炖粉条的东北不是东北,没有刀削面的山西不是山西,没有火锅的四川不是四川,而没有鱼糕、干张肉、八宝饭、皮条鳝鱼……的荆州,就不是荆州。

明器 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明器 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明器 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明器 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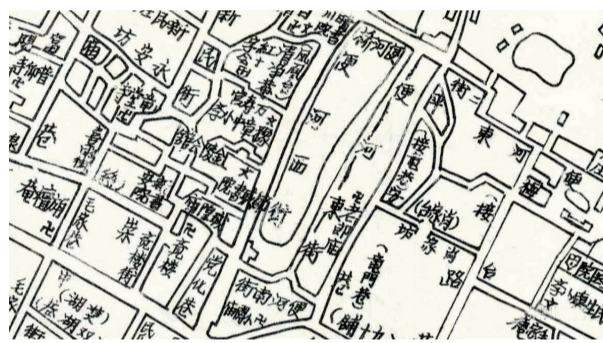
江津风物

在10岁那年,我家从原先居住的巡司巷(正式名称叫中山街)搬到了便河东街。那年月,在我家新居北侧的30来米的地方,有处便河东小学,可住下后来才发现,左邻右舍但在那所学校读书的小伙伴,从来没有以这个正式称呼叫过它,开口闭口总是说“安荆小学”。后来,我长大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居然是古沙市“十三帮”之安荆帮的会所旧址,旧名叫“安荆书院”。

当我在安荆书院的旧址上看到便河东小学时,它的格局已是相当有限了。校园内两排外走廊教室,大约也就十来间;操场不大,也就是南北两侧各树一个篮球架。唯一可以称道者,也就是校园南侧一间白墙青瓦的大屋子。当时发现,它因开间宽、进深大而被隔成两间教室,而审视起来,它应当是这座东朝西安荆书院的南厢房,其开间如此规制,足可见当年安荆书院的气度不凡。

实际上,所谓安荆帮,就是本土商帮,也就是清代荆属八县如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和远安等各地商人设在商埠市镇沙市的商帮。这所安荆书院,也就是清朝末期本土商人们岁时节庆、聚会宴饮时活动的堂口。

便河,是荆州本土的一条内陆河道,它所沟通的水系可达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和远安等地,估计便河之“便”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它还有个“学名”,以其连接沙市与沙洋两地,故被称之为“两沙(沙市、沙洋)运河”。它是中国古代连通长江与汉水的一条人工河,据说其最早由西晋镇南大将军杜预主持开凿;到了东晋时期,另有当朝权臣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州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的王敦,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对河道进行了修整与疏挖。总之,作为汉水自中线地区连通长江的一条运河,便河确实起到便利舟楫、服务商旅的巨大作用。在当年靠着人工掘槽、撑篙带纤而方可溯江西上的水运条件下,帆船从汉口入沔水,再经这里经拖船入川江,要比走长江近500华里的水程,且可免去拖船“九曲十八弯”的往复绕道之苦……总之,在轮船进入长江航道之前,能够在沙市便河的大码头处划块地皮出来兴建会馆的,恐怕也唯有荆州本土的安荆帮才可办得到。



《沙市略图》1942年贾吉云

自然,当我家住进便河东街时,沙市便河的大码头早就萧条、破败了下来:河道淤塞不堪,岸边垃圾成堆,水面乌黑发臭,码头坍塌废圮……我家住的那处居宅,古时即为铺面,由于正对西边,夏日炙烤,热如蒸笼,家人便将那排门取下来,敞开门面乘凉……想来在若干年前,这屋子买卖双方交易还,必定是热闹无比的一个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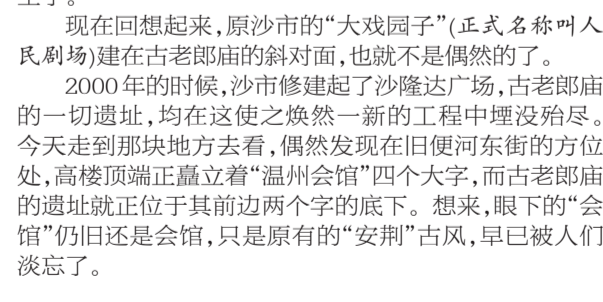
儿时淘气,那会儿有天不记得是犯了什么错,母亲扬言要胖揍我一顿。我不敢回家,却又没胆跑远,便躲进便河东小学西侧的一座大屋子里。到了晚上,又饿又困,心里还很有些害怕,懵懵懂懂地靠在屋角睡着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迷糊中像是听到母亲敲门进来,正叫我的名字。我心头一热,出门自首……那顿打是免掉了,只是从此晚间再没进过这黑沉沉的大屋子。后来,我反复思量过它,这屋子开间十分宽大,进深总有10多米,那年月聚集着10来个工匠,在这里用毛竹做一些日用杂件,如板刷、酒提、坐椅之类的器物,门口还有个招牌,叫“沙市竹木器合作社”。大约那里面存放的工具和材料都不值钱,再说在那个时代,也真没人敢做小偷,所以晚间通常都不锁门。较为令人注目的是,在它的门外左右两旁,各有一尊上马石。

我成年之后,从书中才知道这座屋子是古沙市的老郎庙!据清顾铁卿《清嘉录》称:“老郎庙,梨园总局也。凡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依照通俗的解释,老郎庙是旧时代戏班子供奉祖师爷的场所,同时也是戏班艺人的行帮组织机构。大约正是因为这古代艺人“行帮会所”的大本营,所以在沙市直到改革开放的头些年,京、汉剧演员宿舍,就都在老郎庙的西侧后方的地面上。

后来,多读了点书,发现国内好多古城里均设有老郎庙,其最为瞩目者,当数苏州,其老郎庙“属织造府所辖,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在苏州城里,惟织造府的权势最盛,由该府主持打理老郎庙,自是财大气粗。那么,沙市的老郎庙为什么竟与安荆帮的会所同居一处呢?

原来,明朝时期在荆州府一带发育并成熟起来的楚调艺术,是为后来的汉剧之祖,只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延续发展了数百年,至清代中后期才正式形成汉剧;而早先的楚调,即为如今被称之为荆河戏的地方剧种。直至到了民国年间,汉剧艺人仍视沙市的老郎庙为其祖庭。如此说来,由荆州府所属八个县旅沙客商组合而成的安荆帮,自然也就成了楚调,或承其衣钵者汉剧最主要的施主了。

现在回想起来,原沙市的“大戏园子”(正式名称叫人民剧场)建在老郎庙的斜对面,也就不偶然了。2000年的时候,沙市修建起了沙隆达广场,老郎庙的一切遗址,均在这使之焕然一新工程中埋没殆尽。今天走到那块地方去看,偶然发现在旧便河东街的一方远处,高楼顶端正矗立着“温州会馆”四个大字,而老郎庙的遗址就正位于其前边两个字的底下。想来,眼下的“会馆”仍旧还是会馆,只是原有的“安荆”古风,早已被人们淡忘了。



沙市老照片

□陈礼荣